

存在主义视角下解读余华《兄弟》

金 春 梅*

<目 次>

- | | |
|-----------------|--------------------------------|
| I. 绪论 | IV. 《兄弟》中的存在主义呈现与
人物命运的深度解读 |
| II. 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诠释 | V. 结论 |
| III. 荒诞世界与生存抗争 | |

I. 绪论

余华，这位当代中国文坛的璀璨明星，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天赋和深邃的社会洞察，在文学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新时期文学的杰出代表，余华的作品不仅引发了广泛的文学讨论，还深刻影响了社会观念与文化思潮。2005年，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兄弟》问世，迅速在文学界和读者群体中引起了巨大轰动。这部作品不仅在2008年和2022年两度获得国际认可，还被瑞士《时报》誉为2000至2010年间全球最重要的15本书之一¹⁾。《兄弟》这部作品通过描绘小镇上的两兄弟——李光头与宋钢，在1960至1990年代这三十年间的生活，展现了他们所经历的荒诞、辛酸与苦难。余华运用辛辣的讽刺和对比手法，塑造了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主人公，以此映射出中国社会从1966至1976年的动荡时期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剧烈变迁。小说深刻探讨了这些社会变革对个体命运的深远影响，揭示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抗

* 庆北大学中语中文系 博士研究生

1) 高晓春, 〈余华 空灵而冷酷地“活着”〉, 《全国新书目》 第1期, 2010, 18页。

争。通过对比两位主人公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展现了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扭曲现象。余华以犀利的笔触辛辣地讽刺了这些现象，实现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对人性的深入探讨。

在《兄弟》的“后记”中，余华将这部小说描述为“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并详细概述了文革时期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的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而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则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²⁾。按照余华的解释，《兄弟》在中国当代史和现实中充满了疯狂和欲望，悲剧性和荒诞性，这与加缪关于“人生是荒诞的”³⁾的理论不谋而合。加缪、尼采和萨特作为存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在《兄弟》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余华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与存在主义哲学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相呼应。因此，《兄弟》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余华作品与存在主义哲学关系的平台，也为探讨个体在社会变革中的抗争和适应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余华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作品常常被置于存在主义的学术视野中进行解读。学术界已从多个维度探讨了余华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元素。陈嘉钰在其硕士论文《存在主义视角下余华小说母题的演变》⁴⁾中，对余华小说中的母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探讨了这些母题如何反映出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以及这些母题随时间的演变过程。王海亮的硕士论文《余华小说的存在主义写作研究》⁵⁾则聚焦于余华作品中存在主义写作技巧的具体应用。通过文本细读深入探讨了余华如何通过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象征手法等写作技巧，将存在主义哲学融入其小说创作中。此外，杨明的文章《于虚无中求索救赎之路——论余华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因素》⁶⁾进一步揭示了余华小说中

2) 余华, 《兄弟》,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 669页。

3) 焦君怡, 《荒诞与超越荒诞: 论《西西弗斯神话》中无法消解的荒诞》, 《科学与财富》第32期, 2015, 203页。

4) 陈嘉钰, 《存在主义视角下余华小说母题的演变》,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23。

5) 王海亮, 《余华小说的存在主义写作研究》, 青岛大学, 2020。

6) 杨明, 《于虚无中求索救赎之路——论余华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因素》, 吉林大学, 2012。

存在主义元素的深刻内涵。这些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余华作品中的存在主义色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尽管如此,专门针对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进行存在主义视角分析的文献却颇为有限。在这一领域,张凯成的研究《荒诞境遇下孤独与生存的悲歌——简析余华《兄弟》中的存在主义因素》⁷⁾显得尤为突出。张凯成深入剖析了《兄弟》中的存在主义元素,并认为余华通过描绘两个时代背景下兄弟俩的命运波折,深刻揭示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抗争,以及在荒诞的世界中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与追求。他特别强调了小说中对“世界是荒诞的”及“存在先于本质”等存在主义核心命题的探讨,并指出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在李光头与宋钢两个角色的生存状态和人生选择中得到体现。

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深化对《兄弟》中存在主义表现及其对人物命运影响的解读。我们将细致分析余华的《兄弟》中两位主人公——李光头与宋钢的生活轨迹和性格发展,以及这些如何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理念相呼应。通过对这两位人物的深度剖析,揭示存在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它对个体自我认同和价值实现的影响。在李光头的叙事中,我们得以窥见个体在社会规范与个人欲望的张力下所展现出的复杂性,他的生活历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个体可能遭遇的孤独与挫败。这一旅程不仅是对个人自由意志的探索,也是对社会预设角色的挑战,从而引发我们对存在主义中个体自由与社会责任的深层次思考。

同时,宋钢的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现代社会道德困境和价值冲突的窗口。他的生活选择和内心挣扎,是对萨特“人是自由的”⁸⁾这一哲学命题的深刻诠释。宋钢的故事展现了在生活的苦难和挑战面前,个体如何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定义存在的意义,并且必须承担这些选择带来的后果。这种对个体自由意志的强调,为我们探讨《兄弟》中人物的行为和性格转变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角,并且丰富了对作品哲学内涵的理解。

7) 张凯成,《荒诞境遇下孤独与生存的悲歌——简析余华《兄弟》中的存在主义因素》,《邢台学院学报》第2期,2013,82页。

8) 邓晓芒,《什么是自由?》,《哲学研究》第7期,2012,64-72页。

在分析这两位主人公的生活轨迹时，本文将融合萨特和尼采的哲学思想，以深化对《兄弟》中人物行为和性格转变的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强调了即使在极端的境遇下，人也有选择自己行动的自由，并且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尼采的“强力意志”⁹⁾则提供了一种超越现有社会和道德束缚的力量，鼓励个体追求生命的价值和自我实现。这些哲学观点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兄弟》人物行为的框架，而且扩展了对作品深层哲学意义的探讨，揭示了存在主义在个体生活实践中的体现，以及这些实践如何塑造我们对自由、责任和人性的认识。通过这种多维度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兄弟》所传达的哲学信息，以及它对现代社会中个体定位和价值追求的深刻影响。

II. 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诠释

存在主义，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主要关注的是个人存在的价值，个人尊严以及个人自由。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其本质”¹⁰⁾，即任何一个人，首先必须“存在”，然后通过自己的个人行动、自己的个人选择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定义自己的“本质”。存在主义思想强调个人的主体性、个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个人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自我探索。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没有预设的、普遍的道德标准，个人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验指导的情况下，在“上帝已死”¹¹⁾的空白中，独自面对生活的荒诞和无常，独自进行选择，并且要独自承担后果。存在主义思想带来了深刻的责任感，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孤独感，因为每一个人作出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个体对

9) 尹伶俐, 〈探究尼采的强力意志〉, 《人力资源管理》第8期, 2017, 481-482页。

10) 让-保罗-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6页。

11) 李亚玲, 〈对尼采“上帝之死”的解读〉,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8期, 2017, 59页。

自身命运的承担。

存在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这与当时的社会变迁紧密相关。在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古典主义文明达到顶峰，然而这一繁荣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摧毁了古典主义欧洲，导致社会秩序崩溃政治动荡不安。这一时期的苦难和困境，为存在主义哲学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德国哲学家(Martin Heidegger, 1889.9.26.~1976.5.26.)、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2.23.~1969.2.26)等人开始创作《存在与时间》和《生存哲学》等著作，标志着存在主义哲学的诞生。存在主义哲学家们主张个体存在由个人选择和行动定义，而非外部结构或信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动荡中存在主义逐渐兴起，它强调个人的主体性、自由意志，以及个人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自我探索，这些观点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自我和世界的方式。¹²⁾这种哲学思潮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迁，也为个体在面对社会和道德困境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框架。

在这样的哲学思潮中，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6.21.~1980.4.15)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政治活动家，成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萨特主张“存在先于本质”¹³⁾，这一观点深刻地强调了人的自由选择和个人责任。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意义。人是通过不断的选择来定义自己，而这些选择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先验价值的束缚，从而体现了个体在塑造自我存在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萨特的这些观点为我们理解个体如何在社会中寻找自我定位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也为我们在分析《兄弟》中的人物行为和选择时提供了理论基础。

进一步地，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0.15.~1900.8.25)的哲学思想虽然长期以来被划入“超人哲学”¹⁴⁾，但也有人主张将

12) 宋协立,《理性的光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754页。

13) 王月,《萨特存在主义视域下的《无姓之人》解读》,《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第12期,2024,1295页。

其纳入存在主义的范畴。尼采的存在主义思想带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他批判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并提出了惊世骇俗的著名论断“上帝已死”。尼采强调“强力意志”是生命的本质¹⁵⁾，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尼采认为个体应当不断追求自我超越，去实现自身的潜能和力量。尼采的强力意志，是指个体在面对生命和存在的挑战时所展现出的、所迸发出的力量、决心和创造力。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它推动个体超越自我，克服困难，实现个人的潜能、不断超越自我。尼采的强力意志并非指向一个具体的目标或一个具体的结果，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一种生命的原动力。尼采的强力意志，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对生活的肯定，对生命的肯定；它强调人即使在面对痛苦和挑战时，也要积极寻求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

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主义总是与“战争”、“浩劫”、“动荡”、“苦难”等关键词相互联系。在欧洲大陆，存在主义兴起的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存在主义兴起的背景是冷战、核试验；在日本，存在主义兴起的背景是杜尼特大轰炸、以及2颗原子弹爆炸。而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同样贯穿着“战争”、“浩劫”、“动荡”、“苦难”等关键词。1937年中日战争，千万无辜中国人惨死于战乱，重庆被一次次炸为平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人民没有迎来和平，旋即陷入新一轮战乱。1958年，刚刚恢复元气的新中国，又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的苦日子。1966~1976年，整个社会陷入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蹉跎岁月。1990年代，大规模职工下岗……似乎可以说在整个二十世纪历史中，几代中国普通百姓都生活在持续的苦难困境之中。持续性的苦难与困境深刻地压抑了个体性的发展，严重削弱了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同时，逐步侵蚀了人们的勇气与意志，进而导致欲望的扭曲。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在中国社会中催生了一种特有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深刻地体现了存在主义的本土化特征，可被理解为一种“生存哲学”。

14) 王志伟,〈技术与超人——尼采超人哲学的再评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2卷 第3期,2020,43-52页。

15) 徐洁,〈基于生命的强力意志:尼采论道德教育〉,《代教育与文化》第14期,2022,30-34页。

1960年余华出生在一个双医家庭，童年在医院与家庭间度过，常目睹生死与手术场景，这些经历让他对生死有了深刻的认识。1973年受大字报影响，他对文学产生兴趣。尽管两次高考失败后成为牙医，余华因不满生活的单调而投身文学创作。1983年他发表《第一宿舍》并逐渐崭露头角，随后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成为著名作家¹⁶⁾。在余华的作品中，人物常常面临着无法改变的生存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忍耐”成为一种必备的生存原则。正如余华所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他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庸庸。”¹⁷⁾在余华的作品中，“忍耐”不仅是个人面对苦难时的一种生存原则，更是一种深刻、负责的生命态度。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苦难命运的逆来顺受，同时也映射了社会底层人民在逆境中的顽强生存的一种生命意志。

诚然，“忍耐”在世界各国文学中都有广泛的体现，各个国家都有类似的人物存在。如高尔基(Maxim Gorky, 1868.3.28.~1936.6.14)小说《母亲》中的尼洛夫娜，就是一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最后觉醒反抗的俄罗斯妇女¹⁸⁾。又如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 1799.5.20.~1850.8.18)的《欧也妮·葛朗台》中，拿依也是另一个逆来顺受的角色。她出身贫寒，无家可归、永久地忍受压榨和剥削，变得麻木不仁¹⁹⁾。将余华作品中的忍耐与尼洛夫娜、拿依的忍耐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在于都体现了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不屈。然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同样显著，余华笔下的忍耐更多地强调了对生命意义的坚守和对存在价值的肯定，是一种积极面对苦难的生命态度。而尼洛夫娜的忍耐则更多地出于对家庭与信仰的坚守，带有一定的革命色彩，拿依的忍耐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存策略，是对社会现实的无

16) 王侃, 〈余华文学年谱〉, 《东吴学术》第4期, 2012, 111-117页。

17) 余华, 《活着》(韩文版自序), 作家出版社, 2012, 4页。

18) 刘会玲, 〈从高尔基《母亲》感受母爱的力量〉, 《喜剧世界(上半月)》第6期, 2023, 53-55页。

19) 王欣, 《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像阐释》, 浙江: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21, 423页。

奈接受。这三种忍耐虽然在表现形式和内涵上有所不同，但都是对个体在逆境中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映。余华通过人物的经历展示了忍耐并非消极的屈服，而是一种对生命、对生活的执着与坚忍，一种责任感。以余华的小说《活着》为例，主人公福贵面对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面对失去妻子、儿子、女儿、女婿，最后孑然一身，依然选择承受生活的重压，继续前行²⁰⁾，依然感到自己一生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很满足。这种忍耐的力量，展现了人性中最为坚韧和顽强的一面，是对生命意义的坚守和对存在价值的肯定。

心理学研究指出人的欲望是一种客观存在，忍耐必然导致人的欲望受到压抑，继而导致人的情绪受到压抑；在长期压抑之下，人的情绪必然被扭曲，人的欲望最后必然爆发。基于心理学视角观察余华的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余华作品中，不仅存在着“忍耐”这个特征，同时存在着另一个特征：极端扭曲、爆发的个人主义。这种极端扭曲、爆发的个人英雄主义充分反映了长期压抑下人的情绪、欲望的爆发。以《兄弟》中的李光头为例，李光头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主义的极端扭曲的一种表现形式。李光头与宋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一生不择手段追求欲望的满足，他没有崇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无视道德，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却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个人成功，成为腰缠万贯，抱得美人归的“人生赢家”。他的行为和追求，不仅彰显了尼采所提及的“强力意志”，更以一种近乎扭曲和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对个人成功的不懈追求上，即便这意味着要跨越道德的边界和伦理的底线。李光头作为这种扭曲变形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化身，可以被视为一种“反英雄”的存在。他无视传统道德的约束，运用各种手段来满足个人的欲望和追求成功，展现了一种异化的“强力意志”。

20) 李懿潼，〈活着的重量——读余华的《活着》〉，《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2019，13-15页。

III. 荒诞世界与生存抗争

1960年代~1976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轮大动荡,传统的社会结构在肆无忌惮的暴力和恐怖中瓦解;随着社会结构的瓦解,社会秩序与正常的生活方式也遭到解构,由此导致人们普遍陷入生存困境。在探讨社会动荡对个人生存的影响时,余华的《兄弟》不仅是一个生动的历史案例,也是一个深刻的存在主义文本。《兄弟》聚焦于1960至1970年代中国社会的大动荡时期以及随后的社会转型期,通过李光头和宋钢等角色的命运变迁,揭示了人们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挣扎以及他们在面对生活困境时所展现出的存在主义特征。

《兄弟》开篇余华用夸张、讽刺的笔墨,从“公共厕所”这一独特的视角,描述了1960年代人们的生活困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农村地区所谓的“公共厕所”,不过是在粪池上隔了一堵薄薄的墙,再在粪池上铺了一些木条而已。“恶臭熏得你眼泪直流,粪蛆在你的四周胡乱爬动”²¹⁾。更为荒唐的是,那个时代实行普遍的禁欲主义,导致人们正常的性欲被压抑、被扭曲,于是发生了李光头父子在厕所里偷窥女人屁股的丑事。存在主义认为人在面对无意义的世界时,常常会产生一种“异化”感,即感到自己与周围的世界、与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逾越的隔阂。在《兄弟》中这种“异化”感在动荡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公共厕所”这一独特视角,余华描绘了农村地区恶劣的生活环境,这种恶劣让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使人的行为发生异化,更让人们在面对生活时感到无助和绝望。

这种异化不仅仅体现在李光头父子的行为上,更体现在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之中。在那个压抑的环境里,人们彼此猜忌、相互防范,邻里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每个人都在为了生存而挣扎,却又在无形之中与他人渐行渐远。就像李光头父子,他们的行为被社会所唾弃,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这个荒诞世界的受害者。他们试图通过偷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寻找一丝人

21) 余华,《兄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5页。

性的慰藉，却陷入了更深的道德泥沼。这种行为不仅是对他人的侵犯，更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伤害，使他们在自我认知上产生了巨大的偏差，进一步加剧了与周围世界的异化。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长期处于这种压抑和异化的环境中，人们的心理逐渐扭曲变形。李光头父子的行为只是这种社会病态的一个缩影，它反映出整个社会的心理失衡。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里，人们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只能在本能的驱使下做出一些违背常理的事情。而这种行为又引发了社会的恶性循环，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和对立。在1966年5月16日这个转折点之后，刘镇如同中国的其他地方，被卷入了历史的漩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动荡。

“大街上人山人海，每天都有游行的队伍在来来去去，越来越多的人手臂上带上了红袖套，戴上红像章，手上举起了红语录。越来越多的人走到大街上大狗小狗似的喊叫和唱歌，他们喊着狂热的口号，唱着狂热的歌曲”。²²⁾

在这场运动中，每天都所谓的“阶级敌人”被拉上街头，遭受批斗和羞辱，而这种对个体尊严的践踏，却被一些人视为日常的喧嚣和热闹，这一幕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深刻悲剧。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世界中寻找意义的存在，而当这种寻找被外部力量所扭曲时，人的自由意志和主体性就会受到挑战。在《兄弟》中，李光头和宋钢的童年被这种政治运动所笼罩，他们将这种混乱视为节日的热闹，却未能意识到背后的荒诞性和对个体自由的剥夺。

这种荒诞性不仅体现在世界的无意义上，更体现在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和异化上。存在主义强调个体的自由选择和个人责任，但在那个夏天，人们的选择被政治运动所裹挟，他们的行动和思想被“红卫兵”、“阶级敌人”等标签所限制，这些标签成为了他们身份的枷锁，使他们的人性发生了扭曲。人们在这种异化中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宏大叙事中的棋子，他

22) 余华，《兄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73页。

们的行为变得荒诞而毫无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主体性被削弱，人们的行动不再是出于自我意志的选择，而是被外部力量所驱使。这种外部力量剥夺了人们的自由，使他们在无意识中成为了荒诞世界的参与者。《兄弟》通过这一场景，深刻地揭示了存在主义中的核心议题，在荒诞的世界中个体如何保持自我，如何在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情况下，重新找回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存在主义认为人在荒诞的世界中应当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应被任何外在的标签所束缚。然而，在那个“史无前例”“曲折探索”的“特殊时代”，人们却将独立思考的能力与自己的个性抛诸脑后，成为了权力的奴隶，成为了狂热政治的牺牲品。那些狂热的口号，那些荒诞的口号，它们如同催眠曲，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扭曲的梦境。在这个梦境中，人们不再追求真理，不再关心正义，而是沉溺于权力的游戏，沉溺于对弱者的欺凌。人们疯狂地迫害“阶级敌人”，践踏知识，毁灭文化。图书馆被焚毁，书籍被烧毁，知识被禁锢，人们的心灵被蒙蔽，思想被束缚。在这疯狂的浪潮中，所谓的“革命热情”如同失控的火焰，吞噬了理性与善良。那些平日里和蔼可亲的邻里，瞬间化身为狰狞的施暴者，他们对“阶级敌人”拳打脚踢，口中喊着冠冕堂皇的口号，却不知自己正在践踏基本的人权和尊严。这是一个人性被扭曲到极致的时代，人们的愚蠢和邪恶在政治运动的煽动下暴露无遗，成为了历史躯体上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

在《兄弟》中，作者用浓墨重彩描写了宋凡平之死。宋凡平想去上海接妻子时，却在长途汽车站遭到六个红卫兵的轮番毒打，昏死了过去。听到检票员的喊叫，他竟然苏醒了过来，而且扶着墙壁站了起来，他抹了抹脸上的鲜血，摇摇晃晃地走向了检票口。红卫兵发现后，对着宋凡平又是一顿疯狂的毒打，直到把他活活打死。宋凡平的死亡是极其悲惨和悲壮的，他的死体现了人在荒诞世界中的抗争与尊严。存在主义不仅认为世界是荒诞的，同时也强调人们必须去积极地对抗荒诞。宋凡平面对暴力不屈不挠，他的死亡是对荒诞现实的无声控诉，凸显了人在面对无意义世界时的英勇反抗。宋凡平之死，诠释了“人是自由的”，他的死是人类在极端压迫下依然坚持自我和尊

严的证明。在宋凡平身上，我们看到了存在主义中的英雄主义，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胜利者，而是那种在绝望中依然选择站立，即使面对死亡也不放弃最后一丝尊严的人。他的每一次挣扎，每一次尝试站起来，都是对荒诞世界最有力的反抗。他的生命虽然在暴力中被剥夺，但他的精神却在对抗中得到了升华。他宁可死，也坚持了自己的人性、理性和自我。他用面对暴力选择了抵抗，选择了保持自己的尊严。这种选择虽然最终未能改变他的命运，却赋予了他生命深刻的意义。

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这一转型期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困境。李光头一个因偷窥而声名狼藉的青年，在母亲的苦苦哀求下，得到了一个在残疾人福利厂工作的机会。他凭借自己的机智和努力，竟然在短短一年内让这个厂子起死回生，自己也从街头混混变成了受人尊敬的“优秀厂长”。但命运似乎总爱和他开玩笑，集资失败后他再次跌落谷底，不得不依靠捡破烂和兄弟宋钢的救济度日。然而，李光头并未就此屈服，他通过倒卖日本旧西装再次积累了财富成为了刘镇的“大款”，过上了奢侈放荡的生活。尽管如此，他心中始终念念不忘的是曾经偷窥过的女子林红，最终他不惜一切代价将她据为己有，似乎成为了“人生赢家”。

与此同时，宋钢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作为李光头的兄弟，他在父母去世后一直承担着照顾李光头的责任。成年后宋钢成为了五金厂的工人，并与林红坠入爱河。但好景不长，五金厂倒闭，宋钢失业，随后在水泥厂工作时患上了尘肺病，再次失业。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四处漂泊，甚至为了推销女性用品而接受了隆胸手术。在发现妻子不忠后，宋钢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在遗书中写道“就是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²³⁾，他选择了宽恕，表达了对李光头和林红的谅解，以及对兄弟情谊的坚守。宋钢的离世对李光头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自责之中，甚至丧失了生活的欲望，再次从人生的高峰跌落。他选择了隐居，孤独地生活，只有一个愿望——将宋钢的骨灰送上太空，以此表达对兄弟的最后敬

23) 余华，《兄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643页。

意。

李光头和宋钢展现了人在面对荒诞现实时的不同反应，兄弟俩命运的交织，如同两条并行而又相互影响的轨迹，共同描绘了一幅关于生存、意义和人性挣扎的复杂画卷。李光头的人生轨迹，从流氓无产者到“优秀厂长”，再到捡破烂的混混，最终成为“大款”，这一系列转变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存在先于本质”的理论。李光头并非生来就是“优秀厂长”或“大款”，而是在不断的试错和冒险中，通过自己的行动和选择，塑造了自己的本质。他的生存状态先于他的社会角色，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意志力，不断超越自己的“本质”，追求更高的存在，以致成为“强力意志”的体现，以致成为“超人”。然而，李光头最终陷入“人的本质中有一种本质的失败”²⁴⁾的深渊。他的成功并非真正的自我实现，而是社会环境和个人欲望的产物。他的“成功”建立在欺骗、剥削和背叛之上，这种成功是虚假的，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和意义。宋钢则代表了传统道德伦理的坚守者。他默默无闻，勤劳朴实，对李光头不离不弃。与李光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钢的人生轨迹相对平稳，基本上就是一条抛物线，他的人生选择更多是基于道德和责任，而非欲望和权力。母亲临终的嘱托定义了他的道德、责任，同时定义他的人生本质。他的存在主义特质在于，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即使在面对生活的重压和困境时，也没有放弃对人性温情的追求。

李光头和宋钢的个性和命运，代表了不同类型的两种人在转型期中的不同选择和结果。李光头的成功和失败，宋钢的坚守和牺牲，都反映了个体在转型期中的不同挣扎和迷茫。宋钢的死，严格地说宋钢的自我牺牲，对李光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宋钢死后，李光头的行为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试图通过极端的方式，“将宋钢的骨灰送上太空”来寻求救赎。这种转变体现了存在主义中“向死而生”的态度，即通过面对死亡来寻找生命的意义。宋钢不仅是李光头的兄弟，更是他道德和情感的支撑。宋钢的坚守和牺牲，让李光头在道德和情感上得到了救赎。宋钢的存在，使得李光头在

24)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3页。

荒诞的世界中找到了一丝人性的温暖。李光头和宋钢的故事共同揭示了，人在社会剧变中寻求意义、面对荒诞与死亡的复杂心境。即使在最荒诞的世界里，人性的光辉依然存在，而真正的意义和救赎，往往来自于对道德和情感的坚守。

在探讨宋钢之死对整个故事以及其象征意义的段落中，可以发现宋钢的自杀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更是对一个时代的深刻反思。正如张凯成所指出的，“在作品的后一个时代里，宋钢以自杀的方式退出文本，他的死既是个体生命的结束，也是刘镇的群体性‘自缢’，更是否定改革开放的负面现实。”²⁵⁾这不仅揭示了宋钢悲剧性命运的个体层面，而且将其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审视。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宋钢的自杀不仅是个人的绝望行为，而是对那个时代社会变革中所涌现出的伦理颠覆和道德失范的集体抗议。宋钢的死亡成为了一个象征，反映了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繁荣，还有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和个体精神世界的迷茫。这一观点为我们理解宋钢的死亡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分析框架，使得我们能够从个体悲剧中窥见整个时代的集体焦虑和精神困境。

在《兄弟》中，余华运用辛辣的反讽，对各种荒唐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全面批判。“认亲”是一场高潮迭起的特大闹剧：贪图李光头钱财，又和他上过床的女人，竟然带着孩子来他的公司门口“认亲”。

“有三十多个女人带着三十多个孩子，堵在李光头公司门前的大街上，日复一日地掉眼泪，日复一日地控诉李光头的风流罪行……为了争夺公司门前的一个有利位置，这些女人互相之间打起来了，扯头发吐口水，抓破脸抓破衣服，从早到晚都是女人的谩骂和孩子的哭叫。最后闹到法庭上，李光头被逼无奈，当庭出示结扎手术病历，证实自己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于是，在哄堂大笑中，三十多个原告个个目瞪口呆，有的当场晕倒，有的哇哇大哭，有的要上诉到中级法，高级法院，北京的最高法院……”²⁶⁾

25) 张凯成，〈荒诞境遇下孤独与生存的悲歌——简析余华《兄弟》中的存在主义因素〉，《邢台学院学报》第2期，2013，82页。

26) 余华，《兄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483-485页。

“认亲”这场闹剧展现了社会的荒诞与人性在物欲驱使下的扭曲。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可以为我们提供解读这一章节的新视角。萨特认为当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变得紧张、对立时，他人就可能成为个体自由的枷锁，甚至成为个体的地狱。在“认亲”事件中，三十多个女人为了争夺李光头的钱财，不惜互相争斗、谩骂，甚至上法庭。她们的行为不仅是对李光头个人的攻击，更是对彼此尊严的践踏。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相互成为了彼此的地狱，展现了人性在利益面前的扭曲与丑陋，人性中的善良与尊严在这一刻荡然无存。她们的行为不仅伤害了他人，也使自己陷入了一种道德沦丧的境地，陷入了与他人关系的“地狱”之中。这场闹剧深刻揭示了当今社会某些人对财富的盲目追逐，以及这种追逐背后人性的扭曲。在存在主义的视角下，个体的自由和选择是构建自我存在的基础。然而，在“认亲”事件中，女人们为了财富而放弃尊严和道德，她们的选择不再是个人自由的证明，而是赤裸裸的金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正是尼采所批判的“奴隶道德”，一种放弃了自我超越，沉溺于低级欲望的道德沦丧。这场闹剧也是对社会公正和法律的讽刺。当这些女人将李光头告上法庭时，试图寻求法律的庇护，但最终却因为李光头的结扎手术病历而成为笑柄。这不仅是对法律程序的嘲弄，更是对那些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实现不正当目的的人的讽刺。存在主义强调个体在面对荒诞现实时的反抗和自我超越，而这场闹剧中的角色们，却选择了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应对生活的荒诞。这种荒诞的社会现象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困境。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个体往往失去了自我，成为了他人和社会的奴隶，这种困境正是存在主义所探讨的“无意义世界”的体现。

“处美人大赛”同样是一场精彩绝伦的闹剧。刘作家为了扬名立万，写了一篇《百万富翁呼唤爱情》的报道，把品行败坏的李光头炒作成了“钻石王老五”。于是全国各地的女性争先恐后地向这位超级“王老五”奉献处女的纯情。李光头竟然发现商机，异想天开搞起了“首届全国处美人大赛”²⁷⁾。为了拿到一百万的冠军资金，为了进军好莱坞成为国际巨星，全国各地的处女踊跃而

27) 余华，《兄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507页。

来，刘镇附近的女人们也去做处女膜修复术，处女膜经济随之应运而生。讽刺的是三千多处女参赛，竟然全部是“冒牌货”。

“处美人大赛”这场闹剧，诠释了萨特“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生活是无意义的”这一观点。“处美人大赛”从头到尾是一场互相欺骗的闹剧、丑剧。刘作家为了名利对李光头进行虚假包装，全国各地三千多个女人为了金钱和虚幻的梦想纷纷参与其中，甚至不惜采取欺骗手段，牺牲自己的尊严与纯真。然而当真相揭晓时，三千多人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泡影。这场闹剧折射出在社会转型中，许多人的行为已经失去了理性和道德的约束，完全被虚荣和利益所驱动。人们在追逐虚荣与金钱中失去了自我，让整个社会陷入了荒诞与虚无之中。

余华通过“处美人大赛”这一荒诞不经的事件，不仅展现了社会的荒谬，更是对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一次深刻剖析。这场闹剧，是对存在主义中“他人即地狱”的现实演绎，也是对“自由选择”背后潜在的虚无和绝望的揭露。这场闹剧是对现代社会虚荣心和表面光鲜的尖锐讽刺。在这场以“纯洁”为名的竞赛中，出现了三千多个为了名利而不惜伪装和欺骗的丑陋灵魂。这不仅是对个体道德沦丧的揭露，更是对社会价值观扭曲的批判。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警告我们，当个体为了迎合他人的目光而活，就会失去自我，成为他人期待的奴隶。在“处美人大赛”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群失去了自我，为了迎合社会虚荣而存在的人们。

这场闹剧也是对现代社会中“真实”与“虚假”界限模糊的深刻揭示。在这场竞赛中，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角色，都在进行着表演，以至于到最后，连“处女”这一最原始的身份标识也变成了可以伪造的商品。这不仅是对个体真实性的否定，更是对社会诚信体系的讽刺。存在主义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和真实性，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为了名利而放弃真实，选择虚伪的人们。这场闹剧也是对现代社会中“荒诞性”的深刻体现。加缪曾表示，荒诞主义的核心是人与世界的疏离。在“处美人大赛”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逐渐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疏离，与真实的自我疏离，最终陷入了荒诞的境地。这是对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物质追求中逐渐失去自我，陷入荒诞和虚无的

深刻揭露。

IV. 《兄弟》中的存在主义呈现与人物命运的深度解读

在余华的小说《兄弟》中，我们深入探讨了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李光头和宋钢，他们的命运交织，展现了存在主义中个体自由、个人选择与个人责任核心理念。这两个人物在面对生活的苦难和挑战时，他们的行为和选择不断塑造和突破自我，努力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余华的小说《兄弟》中，作者对存在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阐释和扩展。他通过李光头和宋钢两个人物的对比，展现了“在人的本质之中，有一种本质的失败”。尽管李光头在外表上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他的一生实际上充斥着失败。同样，宋钢的人生也不断遭遇挫折，他在坚守原则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悲剧性挑战，深刻体现了存在主义中关于人的本质中固有失败的观点。宋钢的死不仅为故事增添了悲剧色彩，更为李光头的性格转变铺设了一条重要的道路。李光头希望通过将宋钢的骨灰送上太空，来表达自己对宋钢的敬意和怀念，同时也希望能够在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救赎。他开始反省自己荒唐的前半生，寻求一种更加自由、更加真实的生活方式，这标志着他从原来的“反英雄”形象向更加成熟、更加深刻的个体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李光头摆脱了原来“反英雄”的形象，开始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意义。他不再仅仅关注个人的欲望和利益，而是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行为体现了一种存在主义的觉醒，他试图在荒诞的世界中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一种能够让他的生命有意义的方式。李光头和宋钢都体现了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李光头在物质世界的拼搏不断追求财富，显示了一种对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的挑战，他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他不断尝试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的证明。他的“强力意志”驱使他不断挑战命运，从流氓无产者到“优秀厂长”，再到“大款”，他的每一步都充

满了对生活的抗争和对自由的向往。宋钢则展现了另一种强力意志，他在不断下沉的人生抛物线的逆境中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和对家庭的责任，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未曾放弃对善良和正义的追求。由此可知强力意志并非只是对外在世界的征服，更是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和坚守。

然而这种强力意志并没有使他们免于“本质的失败”。李光头虽然在物质上取得了成功，但他的精神世界却一片荒芜，他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对他人生选择的质疑。宋钢虽然坚守了自己的道德信念，但他的善良和正直并没有为他带来幸福，反而使他陷入了更深的苦难。他们的故事展现了存在主义中的核心观点：即使在最努力的抗争中，人也无法完全逃避内在的失败和荒诞。这种强力意志与本质的失败的双重性，构成了《兄弟》中人物命运的复杂性。李光头和宋钢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人的存在不仅是对外在世界的征服，更是对内心世界的探索。他们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不断地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发生冲突，这些冲突揭示了人的本质中的矛盾和困境。余华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命运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被鼓励去追求个人的成功和满足，但这种追求往往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和道德责任。由此展现出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不仅仅是物质的丰富，更是精神的充实和道德的完善。

李光头希望通过将宋钢的骨灰送上太空来完成自己的救赎，这一超现实的超人行为，不仅是对宋钢的怀念，也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反思。人即使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仍然有选择改变和超越自我的可能。这种可能正是存在主义哲学中最为宝贵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在李光头的转变过程中，尼采的“红脸颊野兽”理论依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深入理解他内心世界的视角。“野兽”部分在他身上的体现发生了变化，他不再仅仅是追求个人欲望的放纵，而是开始将自己的生命力和意志力转向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他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将宋钢的骨灰送上太空，这需要巨大的决心和毅力，这是他原始生命力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他不再被世俗的欲望所左右，而是朝着一个超越自我的目标前进，这种对目标的执着追求体现了他内心深处的“野兽”特质的升华。“红脸颊”所代表的自尊心和羞耻心也有了新的内涵。他的自尊心促使他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自己曾经的过错，他希望能够在宋钢死后为他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以减轻自己内心的愧疚。同时他也开始正视自己的羞耻心，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超越自己的过去，摆脱奴隶道德的束缚。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无视他人的看法，而是开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一种道德的平衡，这种对自我的反思和超越体现了他在存在主义觉醒过程中“红脸颊”象征意义的转变。

V. 结论

在余华的小说《兄弟》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个体在社会巨变中的挣扎与抗争，并将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刻内涵巧妙地融入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李光头与宋钢的命运交织，不仅展现了个体层面的悲剧，也反映了对整个时代背景下人性和社会价值的深刻反思。《兄弟》展示了人在最荒诞的世界中，个体依然能够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赋予生命以意义，实现自我超越。它深刻诠释了存在主义哲学，剖析了现代人在社会变革中寻求意义、面对荒诞与死亡的复杂心境。

通过李光头和宋钢的故事，我们得以洞察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抗争，以及在荒诞世界中寻找生命意义的艰难过程。这两个人物的生活轨迹和性格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余华作品与存在主义哲学关系的平台，也为探讨个体在社会变革中的抗争和适应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李光头的叙事中，我们得以窥见个体在社会规范与个人欲望的张力下所展现出的复杂性，他的生活历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个体可能遭遇的孤独与挫折。这一旅程不仅是对个人自由意志的探索，也是对社会预设角色的挑战，从而引发我们对存在主义中个体自由与社会责任的深层次思考。

同时，宋钢的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现代社会道德困境和价值冲突

的窗口。他的生活选择和内心挣扎，是对萨特“人是自由的”这一哲学命题的深刻诠释。宋钢的故事展现了在生活的苦难和挑战面前，个体如何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定义存在的意义，并且必须承担这些选择带来的后果。这种对个体自由意志的强调，为我们探讨《兄弟》中人物的行为和性格转变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角，并且丰富了我们对作品哲学内涵的理解。

在分析这两位主人公的生活轨迹时，本文融合萨特和尼采的哲学思想，以深化对《兄弟》中人物行为和性格转变的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强调了即使在极端的境遇下，人也有选择自己行动的自由，并且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尼采的“强力意志”则提供了一种超越现有社会和道德束缚的力量，鼓励个体追求生命的价值和自我实现。这些哲学观点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兄弟》人物行为的框架，而且扩展了对作品深层哲学意义的探讨，揭示了存在主义在个体生活实践中的体现，以及这些实践如何塑造我们对自由、责任和人性的认识。

《兄弟》以其文学的力量，让我们见证了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个体如何寻找和定义自己的存在。这部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个体往往失去了自我，成为了他人和社会的奴隶。这种困境正是存在主义所探讨的“无意义世界”的体现。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得以洞察在社会剧变中寻求意义、面对荒诞与死亡的复杂心境。即使在最荒诞的世界中，人性的光辉依然存在，而真正的意义和救赎，往往来自于对道德和情感的坚守。《兄弟》让我们看到，即使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人仍然有选择改变和超越自我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存在主义哲学中最为宝贵的自由意志的体现。

<参考文献>

陈嘉钰，〈存在主义视角下余华小说母题的演变〉，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 2023.
- 邓晓芒,〈什么是自由?〉,《哲学研究》第7期,2012.
- 高晓春,〈余华 空灵而冷酷地“活着”〉,《全国新书目》第1期,2010.
- 焦君怡,〈荒诞与超越荒诞:论《西西弗斯神话》中无法消解的荒诞〉,《科学与财富》第32期,2015.
- 李亚玲,〈对尼采“上帝之死”的解读〉,《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8期,2017.
- 李懿潼,〈活着的重量——读余华的《活着》〉,《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2019.
- 刘会玲,〈从高尔基《母亲》感受母爱的力量〉,《喜剧世界(上半月)》第6期,2023.
-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 宋协立,《理性的光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 王海亮,《余华小说的存在主义写作研究》,青岛大学,2020.
- 王侃,〈余华文学年谱〉,《东吴学术》第4期,2012.
- 王欣,《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像阐释》,浙江: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1.
- 王月,〈萨特存在主义视域下的《无姓之人》解读〉,《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第12期,2024.
- 王志伟,〈技术与超人——尼采超人哲学的再评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2卷第3期,2020.
- 徐洁,〈基于生命的强力意志:尼采论道德教育〉,《代教育与文化》第14期,2022.
- 杨明,《于虚空中求索救赎之路——论余华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因素》,吉林大学,2012.
- 尹伶伊,〈探究尼采的强力意志〉,《人力资源管理》第8期,2017.
- 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 余华,《兄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张凯成, 〈荒诞境遇下孤独与生存的悲歌——简析余华《兄弟》中的存在主义因素〉, 《邢台学院学报》 第2期, 2013.

<Abstract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section of Yu Hua's novel "Brothers" with existential philosophy, focusing on the novel's satirical elements and Yu Hua's engagement with existentialism. It outlines Yu Hua'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impact of "Brothers," then delves into the existential concepts of freedom and choice as portrayed through the characters Li Guangtou and Song Gang. The paper argues that "Brothers" reflects existential themes of individual struggle and resistance in the face of societal change. It also discusses Yu Hua's contribution to the existential dialogue,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e paper concludes by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Yu Hua's work in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 existence and social values, suggesting future research on existential philosophy in diverse cultural contexts.

Keywords: 余华(YuHua) ;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 ; 《兄弟》(Brothers) ;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 萨特(Jean-Paul Sartre)